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

祝百英等著

豐城保學研究叢刊

鍾悌之主編

豐城縣政府第三科刊行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豐城保學研
究叢刊之二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

非賣品

著	主	發	印
者	編	行	刷
者	者	者	者
祝	鍾	豐	豐
百	悌	城	城
英	之	縣	利
等		政	豐
		府	城
		第	利
		三	豐
		科	和
			書
			紙
			印
			刷
			局

豐城保學
研究叢書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目錄

一、當前的政治形勢與政治動員

二、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三、政治常識

四、國際政治經濟之研究

五、社會問題概論

當前的政治形勢與政治動員

鄧初民

當前政治形勢的特點，可以說是從很嚴重的民族危機中，達到了一個新的轉變點。一言以蔽之，就是從過去的內戰，獨裁，不抗戰，達到了和平，民主，抗戰的新的轉變。不過我們要說明這一新的轉變偉大的歷史過程，至少我們要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說起。換言之，即我們要說明當前，對於過去不能不有一個簡單的回溯。

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所給與我們的革命使命，對外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對內是剷除一切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這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對立，是主要的對立，中國社會又是一個半封建社會，封建勢力的與人民大眾的對立，也是主要的對立。所謂民族與民主革命，簡言之，即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不幸這一革命，中經革命勢力之分裂，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間沒有完成。又不幸『九一八』的民族大慘變，突然爆發。把中國命運淪於生與死，存與亡的十字街頭。使得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能不適應着當前具體的政治形勢，而變爲抗日與反漢奸的革命。因爲『次九一八』以後，即刻變更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一方面日帝國主義與中國對立，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中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對立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時，日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對立，也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國內各種社會階層的對立也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換言之，即是民族對立，壓低了階級對立。

但，抗日反漢奸的革命，並不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相衝突。它祇是革命戰術的變更，並不是革命策略的變更。在抗日反漢奸這一革命戰術之下，在抗日第一主義之下，便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爲當前政治實踐的總的路線。

這一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民十五北伐的勝利，可以說是由於統一戰線的建立，其失敗恰恰是由於統一戰線的破裂；然而這一民族統一戰線，却也不是舊的東西。它有它新的姿態。它的範圍是擴大了。它包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做漢奸的人，牠把一切都放在對外的基點上，因而牠與中國過去的統一戰線不同，也與現在西班牙，法蘭西的人民陣線不同；但牠却與世界上的和平陣線有着緊密的聯繫，牠決不是孤立的。

這樣一條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牠的產生，雖然是由於中國客觀實踐的要求，但客觀實踐要求的東西。並不就是自然生長的東西，牠還需要人的努力需要種種社會條件。其最主要的社會條件，可以說一是國內的和平統一，一是國內的民主自由，而最後目標，則為完成我國一致的對日抗戰，從和平到民主，從民主到抗戰，這是「九一八」以後的客觀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

然而這一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却不是「九一八」慘變一開始，就有人提出了的。實在說，「九一八」的開頭幾年，中國所執行的却是與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正相反對的政策。例如我們要求的是精誠團結，和平統一；而那時（日寇已佔了東北四省還同我一步一步進攻不止的時候）却仍在努力剿匪，進行內戰。我們所要求的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實現民主政治，而那時却仍在壓迫愛國運動，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一切自由，幻想造成個人獨裁。我們所要求的是舉國一致對日抗戰，而那時却堅持着不抵抗主義。一句話，我們要求的是和平，民主，抗戰，而那時所行的政策，却是內戰，獨裁，不抵抗。

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是需要一番鬥爭的，需要人的努力的。這一努力差不多在「九一八」以後的三年——一九三五下半年方開始。那時首先就由大眾迫切的要求，提出了組織抗戰的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同時，就開始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社會條件，就是爭取國內的和平統一，所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精誠團結，和平統一」等口號的喊出，都是這一工作的實際表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說就是爭取國內和平統一初步的成功。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歷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確作了偉大的歷史轉變，承上啓下的樞紐。她使我們馬上展開第二步工作，馬上從爭取國內和平統一運轉到爭取國內民主自由運動，馬上從很嚴重的民族危機達到一個新的轉變點。現在中國歷史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上，以很鮮明的筆跡刻劃了一塊永不減磨的界碑。此後中國政治展開了一種新形勢，牠開始由和平統一向民主抗戰之途邁進。和平——民主——抗戰，這是新的政治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的努力步驟。這一步驟敵人是決

不允許我們從容完成的。果然地在我們正集中力量，於國內和平統一有了相當基礎之後，爭取國內的民主，自由，一面藉以鞏固和平統一，一面藉以充實抗戰力量發動舉國一致抗戰時，便爆發了蘆溝橋事件，而且佔領我們的平津了，這樣，他就破壞了我們準備抗戰的步驟，我們也就祇有立即抗戰。抗戰！抗戰！一千一萬個抗戰！這樣就縮短了我們組織抗戰，推動抗戰，實現抗戰的步驟，把我們抗戰提上前了一步，我們決不能說要等國內民主自由徹底實現之後，才能抗戰。更不能把和平民主抗戰的步驟看做機械的。我們並且要徹底認識祇有在抗戰過程中，和平統一與民主政治，才能徹底完成與實現。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句話本來就包含着『戰』才能『統一』的意義。

抗戰已開始了，我們祇有立即總動員。在總動員中包含各種的動員——政治的動員，經濟的動員，軍事的動員，文化的動員，然而在各種動員的組織過程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莫過於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

政治動員是各種動員的『摩托』，如果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不健全，不堅實，不強

有力，雖然你有最完備的軍事組織，最優勢的經濟勢力，最前進的文化水準甚至於最熱烈的民族意識與抗敵情緒，都將不能好好地發揮出地的力量來。

因此政治動員，成了我們總動員中，亦即成了我們同日本帝國主義決最後生死的抗戰中一個頂值得注意的問題，總動員的前途如何？政治動員是其決定者。甚至於抗戰最後的成功與失敗，亦決定於當前的政治動員。

然則政治動員的中心任務在那裏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所謂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就是要使政治的『摩托』在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如在經濟，軍事，文化，民衆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都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極度的靈活，極度的敏捷。

那麼，我們就祇有在各方面推進加強政府中樞，政權機構的工作。

第一，我們要使國內的各黨各派，不分左右，不分大小，一個也不遺漏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二，我們要使國內的軍政當局，地方當局，亦即國內過去不免對立的各實力派，一個也無例外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各階層的民衆，各職業界的民衆，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漢滿蒙回藏，一個一個都忠實赤誠團結在政府中樞的周圍。

這就是說加強政府中樞，其向心力的因素，不僅限於政府本身的直接組成者，同時，還要使廣大的民衆擁護牠。也就是說政治健全，堅實，強化的過程，不僅限於政權機構的一部分，還要及於全部的政治組織，即把政治組織過程，推廣到一般社會組織及人民意識的組織過程。

但是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就是政府中樞的獨裁。恰恰相反，而是要在政治組織的身中包含最大最廣的民主性。所謂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性，就是將政權極度公開，就是把抗日救亡運動，甚至直接的抗戰組織，開放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華優秀的兒女們，把抗日救亡的各種自由——言論，思想，出版，信仰，集會，結社各種民主自由，交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華優秀的兒女們，使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共同討論的機會，

各種不同的問題有共同解決的機會，使全國人民的公意都有直接訴之於政府中樞的機會。這樣，政府中樞所執行的才是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各種職業界，乃至全國人民的公意，由是政府才變成全國人的政府；才能得到全國人的擁護，才能強有力的去執行抗戰，才能強有力的去動員各方面起來抗戰，才能在總動員的過程中去強有力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一切。

譬如，說在目前直接走向抗戰，立即發動舉國一致的抗戰，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抗戰的具體表現昭示國人，則各黨各派各階層的民衆，自然相信政府，擁護政府，（過去割據的封建軍閥，亦失却反對中央的口實，）在抗戰的過程中，要求抗日救亡以至直接抗戰組織之各種自由，尤其是抗戰過程中的極度民主性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各種自由交給他們，則各黨各派各階層民衆，自然祇有對於政府的信仰加深，對於政府的擁護加強。決沒有一個喪心病狂的人還在這樣的政府中樞領導之下搗亂。過去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壓迫衆愛國運動，壓迫其他黨派的抗日活動；而另一方面想在政府或政府黨的包辦之下來『統一救國運動』。其方法是愚蠢，其結果是失敗，

已有充分的事實得到證明。

所以在總動員中，政治動員是最基本的，在政治動員中，政治組織的強化，是最中心的任務，而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是政府中樞的獨裁，倒是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化，所以爭取民主自由，成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條件之一；同時，也是實現抗戰政治動員的主要條件之一。在和平——民主——抗戰一系列的步驟中，日寇不讓我們從容完成爭取民主這一步驟就發動了牠的侵略戰爭——就爆發了盧溝橋事件，而且佔領了我們的平津，我們只有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牠，只有在政治動員中來完成牠。

西安事變以後，各黨派的合作談判已在日益進展。這可以說是政府中樞民主性之最大表現，也可以說從那時起已開始了政治動員，已完成了政治動員的主要部分，也即是說各黨各派已開始統一於中樞政府之下了。

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中央雖亦曾幻想於委曲求全之中得到與日寇暫時妥協的和平，然而平津失陷，已超出了任何人可以容忍的境界，尤其是把蔣委員長廬山第二次談話所提示的四原則破壞無餘，我中樞乃亦不得不從準備抗戰時期走入立即對日抗戰的偉大

時期。因此，各地方當局，各地方軍政領袖——如閻錫山，余漢謀，何成濬，白崇禧，董旭初，劉湘，何鍵，龍雲諸氏，都紛紛入京。這是抗戰形勢擴大之有力的表現，尤其是中樞政府加強，政治組織強化之有力的表現，亦即政治動員之具體的實質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更以廣西領袖之入京爲最尖銳最明朗。這樣，各地方當局也無例外的統一在中樞政府之下了。

再則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全國民衆即風起雲湧組織抗敵後援會，發起募捐，獻勞，宣傳，組織等等運動，亦即開始各種動員準備，而各種動員準備，差不多以京滬武漢等處爲最熱烈，這是把各種抗日救亡的民主自由開放給全國人民之具體的表現，亦即政治民主化之具體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還有政治犯釋放及其通緝令之取消等。現在救亡七領袖是已出獄了，久被通緝的郭沫若已取消通緝，並已從日帝國主義的領土回到『諸夏』了，（郭最近作詩有『願將殘骨埋諸夏』之句）。這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之最具體的表現，尤其是政治動員之最有力的表現。這也將會使全國民衆都忠實赤誠地團結在政府中樞周圍。

這樣，最基本的政治動員就可以完成了。政治動員的完成，同時，就是總動員的完成，我們總動員起來去同日帝國主義拚命！我們一定要戰勝日帝國主義！我們也可能戰勝日帝國主義！

可是我們的政治動員，也不一定就是這樣順利的，這樣的政治動員，一定要受到漢奸，親日派，以及一切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警犬們的破壞，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總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動員，在政治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的民主性，即我們要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民主運動。

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錢俊瑞

從這次上海的戰事掀起了我們全線的抗戰以後，我們的飛機在不斷的施展神威，我們把上海的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同時東北方，我們又把商都和張北次第收復了，我們的大軍正在向察北和熱河挺進，做進一步收復我們整個失地的準備。

這些能告訴我們些什麼？這些軍事上的勝利首先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唯武器論的恐懼者是整個的破產了，——我們的步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騎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砲兵也是能打仗的。而我們的空軍更加能打仗。他們不但能打仗，而且能打勝仗，能殲滅敵人。

於是，恐日病患者絕跡了，這實在是一件應該慶幸的事。然而不幸的，在另外一個極端却在蔓延着一種新的病症。這種病叫做『唯軍事論的虛驕病。』害這種病的人看到我們在軍事上有局部的勝利，便拍拍胸膛大喊道：『你看，只要我們有好的軍隊，有好的軍事佈置，不是我們就能打勝仗嗎？今天我們只要槍桿，只要飛機，別的便什麼都

不要。『這些好漢們在表面上雖然和唯武器的恐日病者相反，然而在根本上他們和恐日病者有一個共同的錯誤。他們都以爲中國對敵人的抗戰完全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恐日病者看到自己武力不如人，所以就害怕敵人；虛驕病在看到自己的武力可以打勝他，所以就以爲單憑我們的軍隊就可以制勝敵人。』

這實在都是大錯特錯。我們應當老實指出，我們如果要用單純的軍事力量；擊毀日本帝國主義，那末我們不但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們終於會失敗的。我們要問：阿比西尼亞，對於意大利的抗戰爲什麼會失敗？我們說，這主要是因爲阿皇並沒有真正的解放民衆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決不是意大利毒氣的過於厲害。我們再問：蘇聯革命以後爲什麼能夠用殘破的物力和粗劣的武器，把各帝國主義的總合干涉軍隊全部驅逐出境？爲什麼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的國民革命軍能夠掃蕩雄厚的軍閥，完成勝利的北伐？我們的答案是：這主要是因爲自己政治的組織超過敵人，軍事力量和民衆力量完全打成一片的緣故。

老實說，今天我們中國要制勝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充分的把握的，然而這把握不僅在

軍事，而也在政治。我們不必隱諱，我們軍事上的物質設備，的確確敵不過日本，因此從積極方面說，今天我們軍在事上小小勝利，還不過是我們全面勝利的起點；而從消極方面說，如我們以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為滿足，而不去開發我們真正可以制勝敵人的園地方，——政治的園地，那末就會因為我們的虛驕而遭到慘敗。

我們可以不必隱諱的說，今天我們的政治的準備是遠遠的落在軍事的佈置之後，所以我們的軍事行動愈挺進，便覺得我們的政治工作愈不夠。同時，正因為政治工作的做得不夠，軍事的挺進就變得緩慢了，軍事上局部的勝利就變得沒有堅實的基礎了。所以我們在今天要大聲疾呼，我們不要把我們的注意局限於純粹的軍事行動吧，我們要把大部份的力量集中到政治的民衆的工作上去。

具體點說，在對外關係方面，我們應當憑藉着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堅決抗戰，團結全世界的友邦到我們的週圍來，我們尤其應當設法增進跟蘇聯的友誼，立即締結中蘇互助我公約，保障們可能從國際方面取得雄厚的奧援。

在國內，我們應該在經濟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人民的生活不至於因為抗戰而